

中国革命史 专题讲稿

第一册

江西省 现代史学会
中共党史学会

前 言

为适应中国革命史党史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江西省现代史学会、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将最近我省部分教学研究工作者的专题讲稿，收集起来，并经过作者的修改充实，铅印成册。

这套专题讲稿共五册，计七十四个专题，约两百万字，它力求反映以下特色：

第一，专题设置涉猎面广。除了党史的主体内容外，还对中国近现代时限内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北洋军阀统治、新军阀统治、伪满政权、汪伪政权等，均有专题论述。

第二，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对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力求以准确的，丰富的史实为依据，秉笔直书，真实地反映历史，并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

第三，理论分析，求是，求新，求深。在六届七中全会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挖掘新材料，阐述新问题，力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比较科学的新见解，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为四化建设服务。

第四，博采众长，交流信息。注意充分吸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研究的新成果、新进展。

全部讲稿由戴向青、黄干周、李元勋同志编审定稿。

限于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史学界同志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编者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前 言

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三大运动高潮·····	李元勋(1)
北洋军阀的派系及其反动统治·····	陈春娥(43)
五四运动及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余伯流(91)
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 次论战·····	余伯流(120)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历史研究综述·····	黄干周(151)
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罗添时(175)
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历史经验·····	孙剑纯(202)
黄埔军校·····	赖仁光(243)
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	余伯流(265)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孙剑纯(28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赖仁光(327)
大革命时期粤、湘、赣 省农民运动·····	文耀奎(347)
从宁汉对立到蒋汪合流·····	孙剑纯(387)
评陈独秀的功过是非·····	戴向青(411)

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三次革命高潮

李元勋

这个专题讲四个问题。

(一)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所谓国情，就是这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

近代中国的国情，从鸦片战争起，发生了根本变化。

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这个条约和它的补充条约——《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7月22日签订）、《虎门条约》（1843年10月8日签订），对中国的影响很大。

第一，勒索了相当于清政府全年收入三分之一的巨款二千一百万元，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

第二，割去香港，沦香港为英国的殖民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并为英国继续侵略中国提供了军事基地。清政府认为割香港只是送一个小岛给“英夷”，供他们修船存货之用。英国侵华全权代表义律却清楚割香港的意义。他说：占领香港可以削弱广州在贸易上的重要性；可以不受澳门葡萄牙人的牵制；可以从军事上控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第三，开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敞开了中国东

南沿海的大门，从此，鸦片和资本主义商品汹涌而来。《南京条约》刚签订，璞鼎查就宣布：他已经为英国资本家打开了一个新世界。香港英文《中国邮报》发表社论，认为：“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制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

第四，允许英人租地建屋永久居住，开创了“国中有国”的租界制度。从此，外国侵略者以租界为据点，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最早的租界是1843年划给英国人居住的上海县城外黄浦江边的130亩荒地，到1848年，英国租地扩展为2820亩。这年，美国也要求租地，15年后，英美租界合并，成立所谓“公共租界”。公共租界最后占地竟达八万亩以上，法租界也占地两万亩以上。继上海租界之后，广州天津厦门…许多商埠都设有租界。在租界里，统治权完全属于外国人，他们设立法院，警察、监狱、市政管理机关及税收机关，施行殖民地制度，把它变成冒险家的乐园，侵略者的天堂、罪犯的避难所。曾在上海海关占据高位的英人魏尔特承认，上海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们的一个真正黄金国。

第五，“协定”关税，从此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条约规定的“值百抽五”的低税率，摧毁了中国的关税壁垒，大大便利了外国对商品的推销和原料的掠夺。

第六，规定英人犯罪，由英国领事馆按英国法律裁判，中国无权过问。这种“领事裁判权”制度，严重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

第七，规定英国可以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条约说：中国大皇帝“如有新的恩施及于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条“利益均沾”的恶例，成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勒索的借口，首先下手的是美国和法国。

《南京条约》签字的消息传到美国，美国总统泰勒立即派遣特

使顾盛率舰队来澳门，以武力强迫清政府于1844年7月3日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美国不仅得到了英国得到的一切特权，而且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在地区上不限于五口，在性质上不限于刑事案件），并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由关税“秉公议定”改为“议允”），这个条约成了其他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蓝本。顾盛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的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

1844年10月，法国专使拉萼尼率舰来黄埔，在法国兵船上与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随后，葡、比、挪、荷、普、丹、西以及瑞典等国纷纷要求“一体均沾”，清政府干脆统统予以满足。

鸦片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下列根本变化。

第一，政治上的变化——战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国家，甚至清政府还自命为“天朝上邦”。战后，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开始走上半殖民地道路。

第二，经济上的变化——战前，中国是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战后，这种封建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成为半封建的社会。表现在下列两点：

家庭手工业不断破产 以棉纱、棉布为例。当时，英法等国用机器纺纱，功效比手工要高几十倍，且纱的质量也好得多。洋纱比土纱价廉物美，输入数量迅速增加，十八年内增长二十多倍。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洋纱如水般涌入后，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纷纷破产，到八九十年代，不仅广东山东浙江等地手纺车被淘汰，就连偏远的贵州，不少地方，

手纺车也被弃掷一边了。

随着手工棉纺业的破产,许多手工业者转而购买洋纱织布,但土布也抵挡不了洋布的倾销。洋布幅宽、价廉、质量精细,八十年代,江苏一带穿土布者“竟至绝迹”。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说:“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

手工棉纺织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手工业,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重要支柱。它的破产,标志着整个自然经济在解体中,其他一些凡是可以用品洋货取代的手工业,如冶铁,制烛等也在日趋瓦解中。

农业产品不断地商品化 与倾销洋货的同时,外国资本还加强原料和农付产品的收购,这就刺激了农民在从事出口商品的生产。例如福建武夷的茶,当时有人说:它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乃自各国通商之初,番舶云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慕效,漫山遍野,愈种愈多。”这就是说:武夷农民受外商收购的刺激,愈来愈多的抛弃粮食生产,去种“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茶叶。这些生产者,原来都是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小农,现在他们专种茶叶,变成种茶“专业户”,离开了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轨道。他们所种的茶叶,就近在乡镇上卖给收购商,收购商将茶叶运到通商口岸转卖给洋商。这样,这些农民就被卷进他们所完全不了解的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伦敦和纽约的大资本家支配着他们产品的价格,主宰着他们的命运,他们被纳入资产阶级齿轮的链条之中。

茶农如此,从事棉花、甘蔗、烟草……等种植的小农也莫不如此,大批地离开了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轨道,引起了整个社会性质的变化。

第三,阶级的变化——出现了买办阶级、现代产业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买办阶级 买办，最初叫“康白度”（西班牙语音译），在鸦片战争前是奉派遣给外商当翻译和经济助手、不受外商雇用的人。五口通商后，它的性质变了，成为外商雇用的人。他们给外商推销商品，收购原料，刺探情报。有些人逐渐自己设店营业，形式上独立，实际上完全依附外国资本，他们的命运和外国侵略者紧密相连，成为买办阶级。上海最早的大买办是美商旗昌洋行的吴键彰、英商怡和洋行的杨坊，他们是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恶名昭彰的人物。

无产阶级 中国近代产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大体上可分三批。最早的是鸦片战后外国在黄埔、香港、上海建立了几家船舶修造厂，从中出现了第一批产业工人；还有通商口岸的海员和码头工人。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在洋务派的工矿里，产生了第二批产业工人。七十年代以后，在中国民族资本企业里，产生了第三批产业工人。他们受剥削压迫在世界各民族中是少见的。据统计，甲午战争前后，上海英商耶松船厂男工每天工资二角六分，按当时每百斤米二元八角计算，只能买九斤多米，而一般女工的收入只能买四五斤米。与外国技工待遇比较，苏州制炮局外国技工每月三百元，中国技工只三十元，相差十倍。普通工只七八元，他们工资低，工作时间却长。湖北织布局工人每日工作十三小时。每半个月才休息一天。有的工厂甚至工作十八小时。残酷的剥削压迫，使中国工人阶级成为最革命的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市场和劳力源泉。七十年代起，少数商人、地主、官僚、买办，看到新式企业获利甚巨，便投资于新式工业，产生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民族资本。第一个民族资本企业是1872年侨商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该厂工人最高达六七百人。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民族资本经营的缫丝厂、面粉厂、

火柴厂、造纸厂、印刷厂……陆续出现，九十年代出现机器棉纺厂。重工业微乎其微，主要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有几家修船厂。

民族资本企业投资少、规模少，又处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时代，自始即受外国资本的压迫排挤，不少企业因而倒闭。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上奏就如实的反映了这种情况。他说：“洋商见我工商竞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勒价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缫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抵押与洋商者。”“华商有束手之危，洋商成独揽之势。”

民族资本还受到国内封建势力压迫。陈启源的继昌隆厂，被当地官府视为异端，勒令停业。北京武举李福明的机器磨坊因拒绝停办命令，李被捕送刑部“照例治罪，以儆刁顽。”

由于受国内外双重压迫，民族资本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有尖锐矛盾；另一方面。它又与它们存在依附的关系，大多数民族资本工厂的机器设备乃至原料燃料，都由外国购入，技术也请外国指导，有些企业甚至设在租界以求保护。至于对本国封建势力的依附就更大了。创办企业得官僚地主支持，减免税收得向官府申请，甚至不少企业的创办人本身就是官僚地主。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另一方面又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总之，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情开始了根本的变化，由封建性质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由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加上了一个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国社会的阶级变化和阶级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时代向人们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在中国近代史上，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曾经尝试去领导人们完成这一任务，它们先后发动了三次大的运动，但都失败了。反帝反封建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

身上。

下面我们讲三大运动高潮。

（二）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峰，它历时十八年，纵横十八省，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斗争之烈，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农民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太平天国运动的最早组织者是洪秀全和冯云山。洪秀全从十八岁开始充当乡村私塾教师，深知民间疾苦，同贫苦农民有血肉联系。他曾多次去广州考秀才不中。在广州，他得到一部基督教的布道书，名叫《劝世良言》，宣传上帝、天堂、地狱一类宗教信条。1843年，他最后一次参加考试失败后，与封建科举仕途完全决裂，立志推翻清朝统治，与同学冯云山一起，在广东家乡花县官禄布村宣传敬拜上帝天父。洪秀全自称是天父耶和華之次子，基督耶稣之弟，下降凡间，拯救世人。第二年，两人离开家乡，沿途靠贩卖笔墨为生，进入广西桂平、贵县一带，得到信徒百余人。1845年，洪回家乡，一面教书，一面研究教义，写出《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书。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以教书、打短工、捡牛粪为生，继续吸收信徒。1847年，洪来到紫荆山时，信徒已有二三千人。

信徒日渐增多，与地主团练经常发生冲突。1848年1月，紫荆山恶霸率领团练逮捕冯云山等，向县府控告冯“阳为拜会，阴为谋叛”。洪急回广州，幻想利用清政府准许洋人传教的命令，向两广总督呈诉，但是毫无结果。

冯云山被捕后，烧炭工人杨秀清、肖朝贵假托天父天兄附体，团结广大信徒，并发动捐款营救冯云山等。十月，桂平县将冯云

山释放，押解回籍，途中，冯说服押差，一同返回紫荆山。

1849年夏，洪、冯二人在紫金山发动信徒开炉打制武器。1850年夏，洪派人分赴各地，通知信徒于11月4日集中金田村。各地信徒纷纷变卖家产，奔向金田，将财物交给公库，生活由公库供给，这就是太平天国“圣库”制度的开始。到了预定的11月4日，抵达金田人数达一万以上。就在这一天，信徒们和清兵进行了第一次战斗，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随后又两次大败清军。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这天，金田村庆祝胜利，洪宣布建国号“太平天国”。九月，占领第一座城市永安，队伍发展到四万人。在永安，洪封杨秀清东王、肖朝贵西王、冯云山南王、韦昌辉北王、石达开翼王，封秦日纲、胡以晃、罗大纲等丞相、总制军师等职，逐步组成革命机构。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击毙清军“百战之将”长寿、长瑞、董光甲、邵鹤令四个总兵及其他官兵四千余人，直捣桂林城下，清钦差大臣邦办乌兰泰中炮死，临死向皇帝奏报说：“奴才不善用兵。”

1852年12月，太平军攻克汉阳汉口，次年一月攻克武昌，占领第一座省城，击毙第一个封疆大吏湖北巡抚常大淳，队伍发展到五十万人。咸丰皇帝发出了“吃睡不安”的哀鸣。急派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督兵进防安徽、江苏，企图挽回败局。

1853年2月，洪秀全、杨秀清指挥五十万水陆大军，夹长江两岸顺水而下，冲破陆建瀛设在湖北东部的江防防线，击毙总兵恩长，陆逃回南京。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九江、安庆，击毙第二个封疆大吏安徽巡抚蒋文庆，清政府慌做一团，下令惩办陆，要他戴罪立功。3月19日，太平军打下南京城，活捉钦差大臣陆建瀛，斩杀之。第二天，头戴红巾，身穿短衣，手持刀矛的太平军，25人一队，威武雄壮地开进南京城，斩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29日，洪秀全在十万人的欢呼声中进入南京，改

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以两江总督衙门为王府，建立了与清朝政府相对立的政权，军队发展到二百万人。

5月，太平军兴师五万，渡江北伐，十月逼近保定天津，清军狼狈奔逃，一片混乱。山西巡抚哈芬逃跑，咸丰降旨逮捕，竟找不到下落，只好一面速问钦差大臣直隶总督额尔经纳，一面自己也做逃跑打算。马克思高兴地说：“皇帝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时的行宫所在地热河。”

太平军不仅沉重地打击清朝封建政府，还沉重打击外国侵略军。英法侵略军在迫使清朝政府屈服，签订屈辱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后，便明目张胆地向太平军进攻，遭到太平军的迎头痛击。太平军打伤英军司令何伯、击毙法军司令海军上将卜罗德、活捉所谓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恩德、击毙法国驻宁波舰队司令勒伯勒东及他的继任者达尔第福，当臭名远扬的侵略者、“常胜军”头目华尔被太平军击毙后，美公使蒲安臣向林肯总统报告说：“我很悲痛的向你报告华尔将军的死耗，他是一个美国人。”

起义者将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每次农民起义都提出并企图回答这一问题，但太平天国第一次做出了农民起义所能做到的最完整的回答，没有停留在“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赋”等笼统口号上。定都天京后，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主要内容有：

第一，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分田办法，把土地分为九等，不论男女，平均分田，好坏搭配。分到田的农户每家要栽桑麻、养蚕、织布、缝衣。还规定每家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暖。”的社会

第二，建立地方政权——乡官制度。基层组织是“两”，每25家为一两，两设司马管理，叫“两司马”，两司马以上设卒长、旅帅、师帅、军帅。军帅管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每家出一人当兵。

从军帅到两司马的各级官员都叫乡官。乡官平时管理本单位的教育司法财政生产等事，战时率兵作战。各级乡官三年一次逐级保举，层层上报，逐级核实，直到天王，由天王降旨，决定升降。

第三，设立“圣库”制度。以两为单位设圣库一座，农民全年收入包括粮食和所有农村产品，除按标准留下口粮外，一律上交圣库，“凡麦豆麻布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所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鳏寡孤独残废皆颁国库以养。”要使“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全天国实行一种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度，据敌探张德坚描写：“伪官虽贵为王侯并无常俸，惟食肉有别，伪天王日给肉十斤，以次递减，至总制半斤，以下无与焉。”《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建设新世界的蓝图，集中表达了千百年来贫苦农民梦寐以求的愿望。

由农民自身发动的反帝反封建战争，象暴风骤雨，给封建秩序以严重的冲击破坏，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没有也不可能导致生产方式的变革，因而不能产生新的思想意识和新的政权制度，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的重任。

首先，从意识形态方面看。农民既不可能产生新的生产方式不可能挣脱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生民主主义思想，因之封建的伦理观念、平均主义、个人迷信等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仍占统治地位。

平均主义 天朝田亩制度所想望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公有制社会，其实不过是两千年来农民过惯了的贫穷的、闭塞的自给自足经济，每家养五六只母鸡、两条母猪、婚嫁时领一百斤谷一千铜钱，他们的理想社会既美好又暗淡，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怎能建立起真正理想的天国。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产生的只能是个人独断独行的家长制，这是它的阶级特性。建立在小

农经济基础上的政权，领导人物不能不受这种阶级特性的制约。《天朝田亩制度》原想建立一个以天王为首的统一集中的国家，过家庭式的民主生活。想不到以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生产基础，除了产生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外，不可能产生别的。马克思说：“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质来说，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在这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农民们政治上的代表，一定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太平天国的社会里始终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洪秀全深恶痛绝“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的行为，认为“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他说：“君臣关系是天父天兄纲常”，在《原道救世歌》里，他说：“富贵在天生死命，总之贫富天排定”他提倡颜回的“非礼四勿”，特别突出的是，他晚期的君权思想、夫权思想都有高度发展。他作《天父诗》，说什么：“只有嫂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君错”，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在《十款天条》里，他说：“贫穷富贵皆靠上帝排定”。他还说：“妻道在三从，勿违尔夫主，牡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在他的《十教诗》里，对妇女有“十该打”的规定，有母子严别、兄妹严别、叔嫂严别的规定，所谓“子大七岁不同床”、“妹大五岁手莫摸”。幼天王说：“我九岁后，想看母亲姐妹，都是乘老天王有事坐朝时偷去看他。”还有一些十分严酷的规定，如臣下唤妃子姓名或偷看一眼就要杀头甚至五马分尸、点天灯。

个人迷信 太平天国是利用宗教迷信来发动群众组织教育群众的。洪秀全根据《圣经》的“十条戒命”，颁发《十款天条》，用宗教统一思想意志、统一步调。他自称天父次子，宣布奉天父天兄圣旨来做“万国独一真主”；杨秀清自称天父附体，代天父发言；肖朝

贵自称天兄附体，代天兄发言。太平天国规定军民要天天读经，餐餐祈祷，“同时长跪同祈祷，同时蹶起同狂呼，每饭不忘除妖魔。”利用宗教情绪改变农民保守散漫因循的生活方式，使之奋起和清军作战，当然有积极意义。但是，利用天父天兄来树立个人权威，利用儒教伦理纲常来制造个人迷信，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意识的大膨胀，洪秀全的“只有臣错无君错”，岂不是历代王朝所谓“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再版么？他晚年越来越陶醉在个人迷信里，臣下捧他：“京为天京，国为天国，身为天王，口为天口，言为天言”，歌颂他：“赫赫我王，奄有四海”，他都很乐意接受。天王“奄有四海”，东王也不甘示弱，要人作诗歌颂他：“四海之内有东王”，隐露内讧之危机。内讧前夕，个人迷信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再从政权性质方面看。太平天国的政权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以下几点可以表明：

庞大的封建官僚机构 天王之下设七王十一侯，其中东王、北王、翼王三个王府各设六部尚书，机构庞大。后期洪秀全滥封王爵，1864年七月，太平天国竟有王二千七百多个。

严格的封建等级特权 太平军一进南京，就把总督府、将军衙门占据为王府，并大大扩建，征调大批男女劳役，夜以继日大兴土木，“木工瓦工千万人，营营扰扰昏至晨”，各王“以令人咋舌的排场显示自己的权力和威风”。从天王到诸王，拥有千以上的侍从人员。极为严格的封建等级有极为严格的规格待遇，不得逾越，天王大轿由六十四人抬，东王大轿由四十八人抬，……两司马用四人抬。百姓不准穿红黄衣服，违者杀头，丝毫没有近代民主气息。

天王的无上权威 天国法令规定“生杀由天子，诸王莫得违”。天王称太阳，王后称月亮、副月亮等等。正副月亮分别住正副月宫内。天王称万岁，三呼；太子称万岁不三呼；其他子称“永岁”，

规定代代如此。

起义之初，洪、杨与士兵并肩战斗，生死与共，具有旺盛的斗志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士卒“布衣襤褖，囚首垢面，鹑衣百结”，洪、杨也“敝衣草履，徒步相从”，天王与诸王“寝食必具，情同骨肉，有事聚商一堂”，真正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定都之后，追求个人权威，追求享受。为了建立一个平等的天国，千百万群众流血奋斗，天国刚诞生，又筑起一个等级森严的壁垒。洪深居内宫，从不出户，“人罕识其面，虽宠任如佐天侯，亦不得望见颜色。”这一切说明，天国政权的性质迅速向封建转化。思想封建化和政权封建化成为天京内讧的根本原因。

奠都天京三年后，内讧的历史大悲剧发生了。内讧的直接原因是掌握军政大权的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的特殊地位，逼洪封他为万岁，洪密诏在江西的韦昌辉回天京诛杨。韦袭杀杨后，为摧毁杨积蓄多年、盘根错节的力量，滥杀杨的部属，杨部没有引颈就戮，于是双方“闭城月余，互相残杀”，“东党为北贼杀者约万人”，洪韦部死伤也相当，“共杀两万余人”。事变发生后，石达开赶回天京，韦又要杀石，石逃出城，韦将石全家杀死。韦势盛，洪又“合众力”杀韦。这次大事变，不仅太平天国首义诸王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先后被杀；而且二万多身经百战的将领和战士也倒在互相残杀的血泊中，清朝官方的报告说，看到长江上有无数“长毛”的尸首顺流而下，才知道天京发生内讧，于是额手称庆。

天父的第二子洪秀全联合第六子韦昌辉杀了第四子全家；第七子石达开逃走了，全家又被第六子杀死；然后第二子又联合天父众多的儿子杀死了第六子；而天父的几万子女也在互相残杀中死去。这一切，用神学的观点怎样去解释呢？说这是韦的阴谋，无所不知的上帝为什么不知道韦的阴谋？说上帝是无所不能的，